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

耿昇 何高济 译

K919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

耿昇 何高济 译

中 华 书 局

1985年·北京

3187 67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

耿昇 何高济 译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11.1 8印张·226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2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1261 定价: 1.35元

目 录

中译者序言	5
前言	9
导论	11
序言	23
第一章: 鞑靼人地区, 其方位、资源和气候条件	25
第二章: 鞑靼地区的居民、服装、住宅、产业和婚姻	28
第三章: 鞑靼人崇拜的神, 他们认为是罪孽的事, 占 卜术、涤除罪恶和殡葬仪礼等	31
第四章: 鞑靼人的淳风和陋俗, 处世之道和食物	39
第五章: 鞑靼帝国及其诸王的起源, 皇帝及其诸王的 权力	45
第六章: 关于战争、军队的结构和武器, 关于战争的 韬略和部队的集结, 对战俘的残酷性, 对堡垒的包 围和对于投降者的背信弃义	61
第七章: 鞑靼人怎样媾和, 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名称, 对自己臣民的压迫, 勇敢抵抗他们的地区	69
第八章: 怎样同鞑靼人作战, 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他 们的武器和部队组织, 如何对付他们的韬略, 堡垒	

和城市的防御工事, 如何处置战俘	76
第九章: 鞑靼人的省份以及我们所经过那些省份的 形势, 在那里会见过我们的证人, 鞑靼皇帝及其诸 王的宫廷	84
柏朗嘉宾旅程路线	110
注释	114
附录:	
波兰人班涅狄克脱对柏朗嘉宾出使的叙述	160
译名对照	166

总 目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1—175
鲁布鲁克东行记·····	177—348

中译者序言

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年)是意大利人,出生于佩鲁贾(Péruugia, 法文为 Pérouse)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小兄弟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方济各(Saint François d'Assie)的挚友。在1245年之前就曾先后奉命前往德国和西班牙执行圣命。1245年4月16日(复活节),根据里昂主教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他在高龄六十五岁时奉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教皇之旨令,从法国里昂登程,出使蒙古。

柏朗嘉宾在两年半多的时间内从西欧到中亚,万里跋涉。他先于1246年4月4日到达伏尔加河畔的西蒙古拔都幕帐。后于8月24日抵达哈刺和林,有幸参加贵由皇帝登基大典。同年11月13日,他离开哈刺和林返国,于1247年5月9日再经拔都幕帐,最后于1247年11月24日返回里昂。他后来还曾作为教皇使节而出使法国。柏朗嘉宾于1252年卒于今南斯拉夫境内的达尔马蒂亚。

在十三世纪时,蒙古人征服了东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向欧洲推进,曾一度挺进到波兰和匈牙利。西欧诸国对此惶惶不安,所以急欲刺探蒙古人的动向、军情、实力、作战韬略,制定抵御其进犯的良策。教皇派遣柏朗嘉宾出使蒙古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当然,教皇在委托柏朗嘉宾所携致蒙古人的信中也试图规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和接受洗礼,甚至还想

与之建立盟邦关系，但没有达到目的。所以柏朗嘉宾主要是以罗马教皇的“军事间谍”的身份出使蒙古的。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所以柏朗嘉宾向教廷所写的报告《蒙古史》中重点介绍了蒙古人所进行的战争、征服的地区、武器装备、如何对付蒙古人的入侵及其风俗习惯等等。因为柏朗嘉宾的出使比中世纪其他欧洲旅行家们东游的时间要早，如鲁布鲁克的出使是1253—1255年，马可波罗东游是1271—1295年，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东行是1318—1328(?)年。所以，柏朗嘉宾介绍的有关蒙古及中亚的许多情况是首次传入欧洲的。其行纪中所记载的资料至今仍是研究元蒙史和中国北方地区历史的宝贵参考资料。但由于柏朗嘉宾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使罗马教廷深信蒙古人意欲西征，要求进行战备，并且呼吁先发制人地对蒙古人发动战争，所以他有意过分地渲染了蒙古人及其所征服的东方诸民族的残暴性和陋习等等，并极力进行歪曲和丑化。因此，书中的某些说法并不是真实的。

柏朗嘉宾东行的见闻录《蒙古史》一书在数世纪以来反复转抄、翻译和重版，先后出版了拉丁文、德文、英文、俄文和法文等等文本。我国学者过去也常有引用。1965年，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研究室余大钧先生根据1957年苏联沙斯契娜(N·P·Shastina)夫人的俄译本译出此书，内部发表，这就大大地方便了我国学者。1965年，法国美洲和东方书店(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出版了贝凯(Dom Jean Becquet)和韩百诗(Louis Hambis)所译注的最新法文本：《柏朗嘉宾的〈蒙古史〉》。我就是根据这一版本而译出，但

按照中国学者的习惯而把书名译作《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本书的序言和注释系由韩百诗所作。韩百诗（1906—1978年）是伯希和的得意门生，著名的蒙古学和中亚学家。他曾先后担任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所长、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研究导师、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主席、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所长、法国亚细亚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他的蒙古学和中亚学著作甚多，如与伯希和合译注的《圣武亲征录》、对《元史》卷107和108的译注、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关于中亚历史和文明的研究等。他尤为善于使用汉文、西文和中亚民族语言的各种史料，可以称得上法国当代最有权威的蒙古和中亚学者之一。

柔克义(W.W.Rockhill)的《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注)中有由波兰人班涅狄克脱对柏朗嘉宾出使的叙述，现由何高济同志译出，附在本篇之末。书末原附索引，我们将它改作译名对照表。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蒋本良同志曾对译文作了校订，陆峻岭和何高济同志对译文也作了校阅，中华书局的编辑同志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表示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昇 1982年国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前 言

十三——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游记故事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对它们的翻译必须同时兼有两种才能，而这两种才能却又很少能汇聚于同一人之身：既要精通当时的拉丁文，又要熟悉行纪中所描述地区的历史和语言。实际上，各位游记作者都以不同的确切程度记载了他所听到的那些名词，无论是人名、地名，还是专用名词术语或者是动植物的通称。

《蒙古史》(L' Ystoria Mongalorum) 一书即属此类著作，所以贝凯(Dom Becguet)先生和我决定翻译此书，并附一些简单的说明性注释。我们二人各自都遇到了一些属于不同范畴的难题：柏朗嘉宾(Plan Carpin)游记原文有时晦涩难懂，尤其是在涉及到描述时更为如此，因为作者没有找到恰如其分的名词术语；其次是某些东方词汇的转写词有时又被出版者们所歪曲讹变，这些出版者们虽然是优秀的拉丁语学者，但在使用东方学规则方面则缺乏明确的概念，这也是在范登温加尔(Van den Wyngaert)神父版本中所出现的情况。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只是在我们共同商榷之后，D. 贝凯才翻译出了其中的某些段落。因为对于那些语义不太清楚的拉丁文句子，必需译出一种与我们所了解的蒙古人的历史和习惯相吻合的意思来。至于笔者本人，我试图解释文中出现

的名词术语，范登温加尔神父有时根据不同段落而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译法。因此，我尽力使各种转写形式一致起来，同时也根据可能的原文名词选择最佳的转写形式，对伯希和(Paul Pelliot)曾讨论过的柏朗嘉宾游记中的某些词汇或术语，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我也使用了他所得出的成果；对于译注文中的其余内容，本人也试图采取同样的办法。

重新再版柏朗嘉宾游记时要求利用范登温加尔神父未能得到的两、三种手稿，并对充斥着错误的一些段落进行分析考证，以尽量恢复已失传的原文的本来面貌。因此，本再版译文要求进行大量的考订注释。

我们希望这种初次尝试能引起对其它一些具有同类内容和类似背景文献的译注问世。为了能够使读者们得到一些难以接触到的文献，这是唯一可以速成的方法。

韩百诗(Louis Hambis)

导 论

柏朗嘉宾及其著作

约翰·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于十三世纪末诞生于佩鲁贾(Pérouse,原意大利文为Perugia。——译者)地区,从1221年起,便受圣·方济各(Saint François d'Assise)派遣前往日耳曼,一直到1239年之前,他基本一直在那里行使萨克森修道院长及省教长的职务。其间唯有三年例外,因为他在此期间以同样的身份而侨居西班牙。在里昂主教会议作出决议之后,他又于1245年奉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教皇之令而出使蒙古。

同年4月16日,柏朗嘉宾从该城(指里昂。——译者)登程,首先到达了布雷斯劳(Breslau,波兰境内。——译者),在那里携波兰的班努瓦(Benoît)教友同行并充任自己的翻译。他们二人行至乞瓦(Kiev,基辅),于1246年2月3日再从那里出发而于同年4月4日到达伏尔加河畔的拔都(Batu)幕帐中,拔都又把他们护送到了哈刺和林(Karakorum),因而得以在那里于8月24日参加贵由(Güyük)大汗的登基典礼。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两位教友便于11月13日离开哈刺和林,在1247年5月9日又重新抵达拔都幕帐中,接着又回到乞瓦。他们在后一个地方进行斡旋,以谈判当地教会与罗马教廷的联合。他们在归途中然后又经波兰、波希米亚(Bohè-

me)、日耳曼、比利时和香巴尼(Champagne, 法国境内。——译者), 最后于 1247 年 11 月间返回里昂。

柏朗嘉宾还曾受遣出使法国国王圣·路易(Saint Louis), 于 1252 年歿于达尔马提亚(Dalmatie, 今南斯拉夫境内。——译者), 当时身居安蒂瓦利(Antivari)的大主教之荣职。

除了那本以《蒙古史》而著称的游记之外, 柏朗嘉宾再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这次出使的正式目的就在于劝说蒙古人的君主接受洗礼和与基督教国家建立盟邦关系, 但这一打算未能如愿以偿。教皇的使者还要打探蒙古人令人生畏的军事实力以及他们向基督教西方进犯的计划, 这一部分使命完成得最为理想。

柏朗嘉宾教友身强力壮和具有知人之明, 他懂得在自己个人的观察中再补充以他从在蒙古人中所遇到的基督徒口里获得的资料。自从他归来之后, 他所介绍的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 这就促使他写了一篇有关基督教地区所面临的某些危险的简明报告。

作者在对该地区、居民及其风俗习惯进行描述之后, 又介绍了蒙古人是如何以武器和韬略而相继征服了毗邻民族的。他还力图说明蒙古人正准备继续乘胜对外进行扩张。为了自卫, 基督国王们应该联合起来, 并且要向他们未来的侵略者们借鉴书中所详细描述战争方法。

柏朗嘉宾在其著作的初稿中还附加了最后一章, 其目的是用以追述行程的各站并指出其见证人, 从而为自己的叙述提供证据。实际上, 他经常关心的是仅仅使用个人亲眼所见

和所搜集到的资料，当后者表现得有点耸人听闻时，他又用“据传闻”来略作缓和。尽管书中的某些奇闻（如长狗头的人之类荒诞故事）是按照他那个时代所流传的形式载录的，但他有关蒙古人的第一部拉丁文著作于可靠性和明确程度方面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手屈一指和无可媲美的。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位第一代方济各会士竟丝毫没有以一位传教士的精神面貌来介绍蒙古人，因为传教士一般最热心的是拯救人们的灵魂。但他却更为倾向于以一位特使的感情来叙说。他冒着生命危险，搜集了一批有关人种学和军事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作者着重研究了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和崇拜活动，而又没有为读者们提供一些过分臃肿的教理评论，对于当地民族的瑕疵和美德，他都作了客观的评介，但对于他们社会道德准则的评价则是审慎和颇有分寸的。

然而，还必须强调指出，柏朗嘉宾在最后一章中谈到自己本人及其沿途所受苦难的时候，仅仅是作为一种辅助例证才提及，表现得非常谨慎。他既对蒙古人的意图不抱幻想，也没有建议基督教徒们采纳蒙古人残酷的手段，如屠杀战俘（即便是在战争高潮中也罢）。

全书的笔调风格正如通过其提纲的清晰轮廓所洞察到的那样，全面呈现出了一位老于世故的教士所特有的那种笔锋，其目的仅在于通过一些深思熟虑的作法向他人通报情况并使人对此深信不已。例如，书中的每一章前面都附有一段详细内容的提要。如果说本书的作者也不由自主地引用了某些平庸的《圣经》节录或者表现了对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de Séville）的书生气十足的模糊回忆，那也是极其有限的，

刚刚是轻触一笔而已。他写得非常简练，以致于使许多人认为过分平淡无奇了，甚至有时候还忽略了一些可以明确表达其思想的语法修辞。由于这一原因，他的具体描述常常是模棱两可的，无论是对当地女子们的梳妆发型的描述，还是对蒙古兵士甲冑的记载，都一概如此，有时人们勉强才能看懂行文中究竟是指蒙古人还是指其敌手！

资料来源

柏朗嘉宾并没有直接清楚地提到那些使他得以写成《蒙古史》一书的报告的资料来源，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他搜集书中所载资料的社会背景。他的报告是以个人亲自的观察和从他在旅途中所遇到的那些基督教徒中搜集的资料为基础的，正如作者在其书序言的第三段中所指出的那样。

柏朗嘉宾书中某些段落可以使我们解释清楚其中的问题。我们发现，他利用在乞瓦与哈刺和林停留的机会，得以搜集到了大量有关蒙古人的情况，从而使他可以非常确切地介绍蒙古人历史及其风俗习惯的梗概。事实上，在其故事的最后一部分提到，当他第一次在乞瓦停留时(IX, 2)，他记载了如下情况：“斡罗思(Russie，现译俄罗斯。——译者)的大公瓦西里(Wasili)向我们详细介绍了鞑靼人的情况”。稍后不远(IX, 5)，他同样还指出：“一旦抵达那里(乞瓦)，我们便前往向当地的千夫长和其他一些贵族请教我们前进的道路去了”。他可能获得了许多建议和情况，其中包括有关在前进时所遵循的路线、关于蒙古人对旅行家们的态度、居住在从第聂伯河到蒙古京都之间辽阔地区的各位蒙古封王的采邑情况，最后